

聖

思

言

身

作

陆侃如 牟世金

劉
勰
論
創
作

陆侃如
牟世金

刘 总 论 创 作

陆 侃 如 牟 世 金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frac{3}{8}$ 字数: 97 千

1963年5月第1版

1963年5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册

统一书号: 10102·478

定 价: 0.58 元

序 例

刘勰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伟大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不朽的理论专著。为了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遗产，使它在今天的文艺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尝试着把书中有关创作理论的八篇加以译注；并在卷首写了一篇引言，对他的文学观和创作论作个简单的介绍。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论点起见，后边又附录了几篇有关的论文。限于水平，错误恐怕不少，希望读者们多多指正。

陆侃如

牟世金

1962年7月于济南

目 次

序例

引 言

一	刘勰以前文学理论的发展简况	3
二	刘勰的生平和著作	8
三	刘勰的文学观	12
四	刘勰的创作理论	17
	1. 创作的准备	17
	2. 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	20
	3. 想象、虚构和夸张	24
	4. 内容和形式的安排	26
五	刘勰的批评理论与实践	30

译 注

一	物色	37
二	通变	48
三	情采	59
四	风骨	70

五	体性.....	81
六	神思.....	91
七	夸飾	103
八	鎔裁	113

附 录

一	《文心雕龙》中有关现实主义的論点	125
二	《文心雕龙》中有关浪漫主义的論点	131
三	刘勰論詩的幻想和夸飾	138
四	《文心雕龙》术语初探	145

引 言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一部系統而精深的古典文学理論名著。

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必須深入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文艺战线上的斗士；同时也必須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認真学习我們祖先留下来的丰富多采的文化遺產，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来創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也要建立繼承民族光荣传统的批評理論。

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文艺界那么热烈地鑽研刘勰《文心雕龙》、鍾嶸《詩品》等理論遺產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們要在本书中特別介紹刘勰对于創作的一系列的論点的原因。

一 刘勰以前文学理論的发展簡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刘勰的理論，有必要追溯一下刘勰以前的文学理論的发展过程。

說起我們祖国文学理論的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眞值得我們自豪。即使撇开了年代尚有疑問的《尚書·舜典》、

《周礼：春官》、《周易：系辞》等等不算，至少在《詩經》的某些篇中显然可以看出：早在二千七百多年前的东西周之交，我們的富有睿智的祖先，已經考虑到文学創作的重大意义——既可以歌頌好人好事（如《崧高》說“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又可以批判坏人坏事（如《节南山》說“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尔心，以畜万邦”），既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如《四月》說“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又可以启发感动別人（如《巷伯》說“寺人孟子，作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現了祖国学术史上第一个繁荣的季节。当时主要的学派，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有不少关于文学的議論；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推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弟子們的記錄或自己的写作中，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問題，給后代作家和評論家以不少的启发，并使文学理論的逐步形成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秦汉以后，关于文学理論的論著越来越多。刘安、司馬迁、班固、王逸、卫宏、郑玄等人，常常通过对于过去的作品（如《詩經》、《楚辞》等）的評論，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学各种問題的意見。对于当代的創作，特別对于当时比較盛行的辞賦，也有不少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理論上多少有点系統化的，是西汉末年著名作家揚雄的《法言》和东汉初年伟大思想家王充的《論衡》。在这两部书里，

談到的問題比較多，分析得也比較深刻。這是這一階段的新收穫。

魏晉期間出現了曹丕的《典論·論文》和陸機的《文賦》。它們都是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極其重要的著作：前者奠定了批評論的基礎，後者奠定了創作論的基礎，它們都給劉勰以巨大的影響。此外，如曹植的《與楊德祖書》、左思的《三都賦序》、陸云的《與兄平原書》、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李充的《翰林論》等，也都牽涉到創作和批評的一些問題。道教徒葛洪的《抱朴子·外篇》中，也有不少有關文學的卓越論點。

從東周到東晉的一千多年中，無數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都探討了關於文學的許多問題。綜合起來，主要有下列六個方面：

第一是對於文學的特徵的認識。周秦以來，古書上所用“文”、“文學”等字樣，一般都是廣義的，不專指我們今天所謂文學創作。最早幾乎把一切文化學術都包括在“文”里，但是跟隨著人類歷史日益前進，文學作品日益增多，人們對於文學的特徵也逐漸有所認識，因而逐漸能夠給狹義的“文”以特有的地位。從《論語·述而》中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的“文”，一直到陸機《文賦》中所說的“文”，其遞進之迹是顯然可見的。晉代以後，又漸漸興起了“文”、“筆”之分；雖說也有流弊，但對於文學特徵的明確認識上還是有所幫助的。到宋文帝時，文學便與儒學、玄學、史學分家了。

第二是對於文學的社會作用的理解。儘管早期評論家

对于“文学”認識还很模糊，以后才逐漸清楚，但是对于文学的作用却是一开始就很重視的。伟大的孔子很早就指出：“詩可以兴，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阳貨》）。到曹丕的《典論：論文》，更強調了“文章經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外，不論是楊雄的《法言》、王充的《論衡》，或是鞏虞的《文章流別志論》、葛洪的《抱朴子》里边都对此有所發揮。在这一問題上，过去評論家的意見是大同小异的，他們都一致肯定文学作品能为社会政治服务，能对讀者起巨大的教育作用和認識作用。

第三是对于文学反映現實的重視。既然要求文学作品能起应有的作用，那就必然会要求作品能真實地反映現實。而且，古代优秀的作品本身也常常是植根于現實的土壤中，成为創作密切联系現實的典范，这就給評論家以深刻的启发。所以《礼記：乐記》和《毛詩序》里都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話。以后，从王充到刘勰，都是崇真尚实的。但是我們对此也不应作狹隘的理解，而誤以为他們都反对幻想，因为某些幻想还是有現實基础的。

第四是对于內容与形式的关系的分析。在这一方面，偏重內容或偏重形式的片面主张是出現过的，但比較全面的持平之論却是很早就有了。从子貢卓越的意見“文犹質也，質犹文也，虎豹之鞶（皮）犹犬羊之鞶”（《論語：顏淵》），到刘勰的更透辟的論点“文附質”、“質待文”（《文心雕龙：情采》），显然一脉相承，也显然有所发展。

優秀的評論家既認識到思想內容在文學作品中的主導地位，也認識到藝術形式的不容忽視。

第五是對於創作法則的闡述。從孔子的“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到孟子的“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從司馬相如關於“賦之迹”和“賦家之心”的傳說（《西京雜記》卷二），到揚雄對於“麗以則”和“麗以淫”的分辨（《法言：吾子》），都還只是些零星的議論。陸機在歷史上第一次比較詳盡地論述了構思立意、遣詞造句、謀篇布局，以及音節、警策、應感等一系列的創作問題。雖然他多少有點偏重於形式技巧方面，但對於創作理論的形成有重要的貢獻，對後代理論家和創作家的影響是深遠的。

第六是對於批評原則的探討。批評的實踐是早就開始了的，如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都留下不少關於《詩》、《書》的看法，如漢代劉安、司馬遷、班固、王逸對於《楚辭》都各持己見。在這些評論中，多少接觸到批評究竟遵循什麼原則的問題。舉例來說：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知其人……論其世”的主張（《孟子：萬章》），王充反對“尊古卑今”的偏見（《論衡：齊世》），都是很有意義的。到曹丕的《典論：論文》才系統地論述了文體、文氣的問題，強調了批評的客觀性，使批評理論得以逐步建立。

以上六個方面，是《文心雕龍》以前的學者、作家們的著述中所初步討論過的問題，是劉勰所能繼承的理論遺產。劉勰正是在這樣豐富的理論基礎上，總結了前人創作

的經驗，而写出杰出的《文心雕龙》来的。

二 刘勰的生平和著作

· 古典文学理論經過了一千多年的酝酿以后，到公元五世紀就出現了伟大的理論家刘勰。

刘勰(公元465? — 520?)字彦和，原籍山东莒县，寄居江苏鎮江。他的祖上相传是汉高祖的儿子齐王刘肥的后裔，他的伯祖父刘秀之曾在南朝宋代做过高級官吏；但他自己的祖父刘灵真的事迹却无从查考，可能沒有出仕。他的父亲刘尚做过越騎校尉，死的比較早；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貧困的生活，甚至不能結婚。

公元五世紀的八十年代，著名的佛教徒僧祐到江南講佛学。刘勰家貧好学，便和僧祐同住在定林寺里；他一面协助僧祐整理佛經，一面自己也讀了許多古书。他所讀的书固然也有佛教的著作，但从《文心雕龙》看来，讀的更多的却是儒家經典和历代文学作品。

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曾用富于热烈情感的笔調，追溯他那时对孔子的五体投地的崇拜：

齒在逾立，則尝夜夢執丹漆之礼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接着他就說明为什么要写《文心雕龙》：

數贊(陈述)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經典枝条……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論文。

从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他这时确已成为儒家学說的信徒，而且对儒学古文学派的学者馬融、郑玄諸人的著作評价极高。范文瀾同志說得好：“儒学古文学派的特点是哲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不同于玄学和佛学。尽管刘勰精通佛学，但在論文时，却明确表示唯物主义的观点。”（《中国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第422頁）这正是《文心雕龙》所以富有进步意义的主要原因。

刘勰动笔写《文心雕龙》，大約在他三十岁以后，写成时还不滿四十岁。这时正是公元五、六世紀之間，在南北朝历史上是南齐的末年。就象大家所知道的，古典文学发展到晋宋以后，漸漸兴起了一种重視形式而輕視內容的不良风尚。刘勰对此深恶痛絕，所以他写《文心雕龙》虽說是为了發揮孔子的学說，但事实上他也适当地指导了整个的文学界。他繼承了儒家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吸取了过去文学理論中有益的成分，总結了自《詩經》、《楚辞》以来历代創作的經驗，从而卓越地建立了自成体系的創作理論与批評理論。他一面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文坛上的歪风邪气，一面也有力地推动了以后的創作和批評工作。

全书共五十篇，里边包含四个方面：首先是《原道》、《征圣》、《宗經》、《正緯》四篇；刘勰在这里說明自己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文原于道”的观点。他所謂“道”，

就是“自然之道”。“自然”是客觀事物，“自然之道”是从客觀事物歸納出來的結論，這結論就是客觀事物的規律，也就是宇宙間的真理。文學藝術和一切學術文化、一切思想意識一樣，都來自客觀存在，都服從於“自然之道”。他認為先有“自然”和“自然之道”，然後才有文學藝術；而且既然有了“自然”和“自然之道”，就必然會產生種種的文學藝術。所以“文”的根源就在於“自然之道”；也只有符合於“自然之道”的“文”，才能有鼓動讀者的力量。作家要掌握這個“自然之道”，除必須親自觀察客觀事物外，同時也要認真學習過去聖賢的著作，特別是學習儒家經典；因為他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聖賢，最能懂得“自然之道”，他們的著作也最善於闡明“自然之道”。

其次是从第五篇《辨騷》到第二十五篇《書記》，共二十一篇；劉勰在每篇里，就一兩種體裁進行分析、評論。他對於各種體裁都解釋了它的名稱，追溯了它的起源，敘述了它的發展和演變，研究了若干代表作家和作品，指出其優缺點；最後綜合起來，說明它的特徵，以及寫作時應注意的要點。他一共討論了三十五種體裁：騷、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這些篇雖說是關於文體論方面的，但實際上也牽涉到批評論與創作論，甚至有不少篇具有文學史的性質。在這些分析與評論中，他還隨時貫徹了批判的精神，告訴後人在創作上應走的正路和應

避免的歧途。

其次是从第二十六篇《神思》到第四十九篇《程器》，共二十四篇；这是《文心雕龙》中最重要的部分，刘勰在这里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有关创作和批评的理论。这一方面，我们将在后边专节论述。

最后是第五十篇《序志》，那是全书的总序。刘勰在里边说明了《文心雕龙》的名称，他写书的动机，他对过去评论家的著作的意见，他这部书的内容的大概，并对后代提出自己的希望。

从这五十篇三万七千字里，可以看出这部杰作的伟大意义。早在一千四百六十年前，刘勰以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学者，居然写出这么一部体大思精的不朽巨著，的确值得我们引以自豪。这不但在祖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说是空前的，就在全世界文化史上说也是不可多得的。

《文心雕龙》脱稿以后，并没有为当时文坛所重视。那时作家沈约已做了大官，成为学术界的领袖；刘勰希望他能代为吹嘘，但贵贱悬殊，无法和他相见。相传刘勰曾假装为卖货的，带着自己的稿子，等候沈约出门的时候，到他车子旁边来引起他的注意。沈约看了《文心雕龙》的稿子，十分称赞，于是就传布开了。

刘勰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南朝的齐代变为梁代。他开始做官，最早的职位是“奉朝请”，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接着做中军将军萧宏的“记室”，管理文书工作；又做“车骑仓曹参军”，管理仓帑出入的事务。四十五岁左右，他到太末（今浙江龙游）做“县令”；不久回来，做仁